

目 录

第一章 坚忍不拔 终生不渝

- 革命家周恩来 1
- 一、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2
- 二、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4
- 三、相忍为党，顾全大局 22
- 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27

第二章 驰骋疆场 运筹帷幄

- 军事家周恩来 45
- 一、军事斗争的开创性建树 46
- 二、建设革命军队的方针和原则 52
- 三、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59
- 四、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 68
- 五、加快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82

第三章 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 外交家周恩来 92
- 一、在多重政治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革命者 93

二、红色中国外交的探索者	101
三、为新中国外交奠基	115
四、寻求和平共处,倡导五项原则	125
五、高瞻远瞩,拓展外交新天地	140

第四章 肝胆相照 团结斗争

——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周恩来	161
一、周恩来与蒋介石	162
二、周恩来与班禅	182
三、周恩来与溥仪	196
四、周恩来与李宗仁	204

第五章 体国经野 辅世长民

——开国总理周恩来	215
一、把经济建设放在工作首位	216
二、筹划四个现代化	223
三、躬亲治水	244
四、突破科技尖端	255

第六章 高山流水 知音知己

——文艺工作者周恩来	271
一、同文艺的不解之缘	271
二、高举抗战文艺大旗	277
三、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287
四、文艺界的知己和挚友	301

第七章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	322
一、争做大事,不争当大官	323

二、廉洁奉公 鞠躬尽瘁	331
三、豁达大度 温厚敦信	341
四、克谨守纪 民主平等	349
五、自勉自励 生生不已	354
第八章 经纬万端 各得其宜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360
一、照顾大局抓中心	361
二、组织严密善决策	371
三、知人善任用其长	377
四、驾驭复杂关系的大师	385
第九章 疾风劲草 大雪青松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389
一、“文革”突起,被动卷入	390
二、协助毛泽东,机智处理林彪事件	400
三、纠“左”的努力与曲折	409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19
第十章 思想深邃 纸满经纶	
——周恩来的思想理论贡献	429
一、周恩来的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430
二、周恩来的一些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是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声	452
第十一章 中流砥柱 丰碑永存	
——周恩来的历史地位	465
一、党、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467

二、人民的好总理	470
三、遏制内乱的中流砥柱	484
四、举世景仰的世界伟人	496

第一章

坚忍不拔 终生不渝

——革命家周恩来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恩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青年时代的周恩来，经过几年的“推求比较”，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终于确定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选定了做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在周恩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有几个很值得一提但又常被人忽视的方面，那就是：最初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复杂过程；曾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在党内斗争中一直坚持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原则；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几件事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出周恩来的全部革命工作，但却能鲜明地表现出周恩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独特个性。

一、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在我们年轻的年代，我们的思潮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比较多的，总要经过多次的摸索，反复实践，才能使自己的认识逐步地固定起来。所以当时在群众和革命的青年学生中所组织的革命团体、派别就比较多，时分时合。各种政治倾向变化也比较多。

——周恩来

周恩来生于1898年。他生活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相继侵略中国的时代，是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尽管从1840年林则徐起，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奋起抵抗，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求生存、救中国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人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当时中国革命者的结论。

为了救中国，图生存，周恩来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最初相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他信仰过军国主义、无生主义、无政府主义，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经过几年的“推求比较”，终于确定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选定了做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21年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

年他发起组织旅欧支部,从那时起他就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1.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的祖父,活了近60岁,由当师爷、进而当了知县。但是,他只和二哥在淮安置办了一所房子,没有地产。周恩来的父亲虽说到绍兴学习了三年如何做师爷,但是学得不好,能力差,没有谋到好差事。祖父去世后,家境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儿女。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岁,为了安慰病危的小叔叔贻淦和新婚的婶母,由祖父母做主,深明大义的父母将他过继给贻淦夫妇。两个月后贻淦去世了,他由嗣母陈氏抚养。过继即是子,从此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干爹干娘。陈氏出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通晓诗文。她将周恩来视为命根子,精心抚养,精心教育,教周恩来认字、背唐诗,周恩来5岁入私塾上学。嗣母常常给他讲故事、讲历史,周恩来“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

在两个母亲的爱护下,周恩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好静、喜欢学习,开朗、善解人意。丰厚的母爱,过分的仁慈,使他多了女性的柔韧,少了男性的粗野。

但是他9岁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他带着两个弟弟和八伯母一起生活。八伯是个残废,他是长孙,成为家中要紧的男子。从小他就为家中的事操劳,养成很强的责任心。

12岁时周恩来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先后在铁岭、沈阳上学。他后来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当时,东北经济发展很快,已有了铁路和现代工厂。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北的文化和思想各个方面也十分活跃,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1905年日本、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东北大地上进行了一年零8个月的战争。得胜的是日本,受蹂躏的是中国老百姓。暑假,周恩来随同学到了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村后立下的碑,日本帝国主义在村东头建的塔。这些建筑纪念的是日本、沙俄的武功,表明了中国的耻辱。

到东北后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民族存亡有了切肤之痛。他关心时事,在沈阳养成读报的习惯,常常看《盛京时报》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籍。

他从《革命军》中明白了,一个男子汉除了要光宗耀祖,对家庭尽责任、尽义务外,还要对国家尽责任、尽义务;他明白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胸怀、人格及道德。

这些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少年周恩来的心,印在他的脑海中。他由爱母亲、爱家庭,升华到爱祖国。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升华到对祖国的责任心。

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为了个人的前途。”而周恩来与众不同,他站起来大声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为中华之崛起,这就是他奋斗的志向。这个志向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上述一系列教育才形成的。

当然,如果他的思想仅停留于此不再前进,他可能只成为一个普通爱国青年。正巧这时他的伯父周贻庠由沈阳调到天津工作,他随伯父到天津读书,这样历史就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有进一步接触到更先进的思想。

2. 在天津南开中学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是华北工业的发源地和华北经济、文化中心。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资产阶级思想、教育都十分发达,可与华东的上海并驾齐驱,这是关外的沈阳所不可比的。而他就读的天津南开中学又是国内第一流的学校,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

南开中学教学科目,不仅有语文、外语、历史等文科,而且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周恩来正是在这里受到了全面的近代科学教育。这种教育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南开中学的不少课程是请外籍教师用英文讲授,因此周恩来到三年级就可以读英文原著,这为他日后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周恩来较早地接触到马列主义的著作。

当时,南开中学倡导课外活动,鼓励学生组织社团。周恩来从小失去母亲,在伯伯等亲友的帮助下成长。这个经历使他认识到:人立足于世界上,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因而“服役之事乃人类所不可免”。于是,16岁的周恩来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这个名字既表达了周恩来对自己责任的认识,也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看法。敬业,就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地做事;乐群就是为大家服务,团结大家。由于口号明确,组织得好,“敬业乐群会”很快由20多个人发展到280人,占全校学生的1/3。社团的活动锻炼了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毕业时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到南开中学后他更注重自己的品格道德修养。他在《论名誉》等文章中指出，人的名誉是“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他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组织“敬业乐群会”尽的力最大，可是他不当会长，积极推举别人当，自己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担任副会长、会长。他一生都是这样，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从不争名争利，甘居助手。他的道德修养是有口皆碑、举世公认的，人们称他为“全党楷模”，恰如其分。

他在南开中学还非常关心时事和社会问题。他在作文中写道：“踽踽途中，睹乞丐成群，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几十年后，作家黄宗英向他介绍宝坻县的先进人物邢燕子时，他说：天津是九河之稍，常常发大水，灾民流离失所，流落街头。可见当年老百姓悲惨的生活给周恩来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现实生活逐步使周恩来认识到辛亥革命的不足，他曾在全校的讲演比赛中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当时社会上流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实业与教育相比，教育是根本的。他看到中国贫弱，认为要学习德意志、日本，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

1917年他从南开中学毕业，临别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怀着这样的理想东渡日本，这年他19岁。

如果说他跟着伯父从东北来到天津是被动的，那么这次到日本则是主动的。他要看看日本是如何富强起来的，他要亲自考察一下“军国主义”、“贤人政治”为何物。他一向认为学习要

“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临出国前他以诗言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表达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

3. 面壁十年图破壁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欧洲革命进入高潮，爱尔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也都爆发了革命。这些革命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知识分子。他们以共鸣、希望的笔调介绍十月革命，公开地发表于报端和刊物上。

1918年4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从《露西亚研究》杂志中看到关于对俄国党派的介绍，还记录了列宁的名字。他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周恩来在日本读了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到苏联采访后写的著名报道《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对十月革命、苏维埃、红军、国内战争的了解远远超过国内青年的了解。

1918年8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向西伯利亚进军，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兵力最多时达7.3万人。国家为了筹集军粮，大量征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引发了“米骚动”。暴动是从7月23日开始持续到9月17日矿工斗争结束。这次暴动波及日本全国，57天内33个县都发生了暴动。

因放暑假，7月28日周恩来回国，9月6日才回到日本，他虽然没有目睹日本暴动的场面，但波及日本全国的自发暴动深深地震动了他的心，使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从此周恩来开始重新认识日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周恩来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在日本确定信仰共产主义呢?

他家境贫寒,靠几个叔伯的帮助读完中学。到日本留学,也是靠友人的资助,本想考上官费就可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用。他在南开中学是学英文,日文基础差,第一次考试没有录取,心情苦闷。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家信得知八伯父故去的消息,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没了知觉一样。他思念母亲,夜里读母亲的遗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周恩来还思念爷爷奶奶和爹娘,听说他们的棺材暴露在外面,越想越难过,恨不能马上回国,处理好这些事情。思乡之情,长子的责任,再加上独处异国他乡,使周恩来孤寂苦闷,因此他初到日本时相信“无生主义”(佛教名词)。

这时,他重新看了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茅塞顿开。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富有责任心的周恩来,从那时起就把家庭的悲剧和国家的贫弱联系在一起,他知道家庭只是社会的缩影,对家庭的责任心自然转化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心。正是这种责任心,使他从对家庭的思念和悲痛之中解脱出来,精神为之一振。

他喜爱的格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到日本之后,他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事事都用求学的眼光看,留心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以此来了解日本的国情。他亲眼看到军国主义、贤人政治的真实面貌,虽然国家强盛了,但

是人民并没有由此过上幸福的、太平的生活，贫富反而更加悬殊，国内矛盾非常激烈。于是他改变了对军国主义的看法，开始摒弃了军国主义。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在日本大量地读书、看报，十分关注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对马列主义学说的介绍以及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的介绍。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向到过苏联的日本海员了解海参威的情况，了解苏维埃的情况。

这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打断了他对新思想的探索。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准备密签军事协定，北洋政府要出卖国家主权，中日联合出兵苏联，镇压革命。事情泄露后，激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以天下为己任的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现实的斗争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对信仰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有人说他在日本一事无成，其实并非如此。他是没有考上学校，他在日本也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但是由于东渡前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经过一年半的观察，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矛盾，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这个失望不仅是对日本的失望，也是对军国主义的失望，甚至也是对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失望，从而也为他日后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后确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4.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周恩来自己说过，他是个“多畏多虑”的人。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他出身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做事，不能回家。他带着两个弟弟跟八伯、八伯母生活。封建的大家庭规矩非常多，没有钱吃饭也要应酬，否则就被

人挑理，在大家庭难以生存。八伯是个残废人，不能下地；八伯母作为女人，不能出门理事。应付门面的事就落在 10 岁孩子的身上。为此，他办事处处小心，因而从小养成多畏多虑、细致入微的办事风格。

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周恩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对他确定信仰时的影响更为突出。

1919 年春天他从日本回国到天津，不久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为天津的学生领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起组织觉悟社，领导学生示威请愿。1922 年周恩来向友人谈起自己的转变过程时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和周恩来同是觉悟社社友的谌小岑曾告诉笔者：1919 年 8 月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天津学生到北京包围了总统府等地，遭到军警的殴打，这就是“全武行”。第二批学生再次赶到北京，周恩来也参加了，结果又有学生被捕。

“思想颤动于狱中”是指 1920 年 1 月，周恩来等 21 名战友在天津因抵制日货而被捕。在狱中他们组织起来，一起学习、讨论主义等问题。当时对青年影响较大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马列主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长马骏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这个活动并不表示周恩来已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多于国内的青年。

周恩来出狱后，为了寻求真理来到欧洲。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最发达的地区。1920 年 12 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法国马赛，次年 2 月到法国中部的布鲁瓦学习法文，同时作社会调查研究，为天津《益世报》写通讯报道。但是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对主义的选择，

并且在此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当时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周恩来所到之处映入眼帘的是“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不同的思想杂然纷陈。马列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各国共产党纷纷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而独立。在斗争中，无政府主义的势力渐渐削弱，而被共产主义所替代，这在无政府主义势力较大的法国更为突出。1920年12月，法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法共成立了“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团结组织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在这个联合会活跃着一个越南人阮爱国，他就是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

现实生活每日每时都影响着年轻的周恩来，但是他对主义的选择采取了慎重的态度。1921年1月他初到欧洲，给表兄陈式周写信说：“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后来他回忆这时的心态时说“谈主义，我便心跳”。他对一切主义都采取“推求比较”的态度。周恩来写信给觉悟社的同志说：“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在去年（指1921年）秋后才定妥我的目标。”

他确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参加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开展斗争有关。一场激烈的群众斗争可以迅速地改变人的思想。

周恩来是随勤工俭学学生一起出国的，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勤工俭学学生。第一，他得到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及亲友的资助；第二，出国前他已同天津的《益世报》谈好，为《益世报》写通讯报道，有稿费收入。所以他到法国后没有到工厂做工，而是到

法国中部学习法语。但是他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心着勤工俭学学生的命运。1921年2月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将他召回巴黎。

勤工俭学运动是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吴玉章等人发起的,1915年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号召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为中国培养大批人才。经过几年的酝酿、宣传,这项活动得到进步青年的响应,这些青年大都是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学生们赴法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学生以湖南、四川为最多。1919年3月17日首批学生离上海西去,到1921年1月20日,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马赛,前后共20批,有1600余人。周恩来是和第15批勤工俭学学生同行。

1920秋天,法国工厂纷纷倒闭,或者部分开工,大量裁减工人。勤工俭学学生首当其冲。而1920年,又有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涌进法国,这使学生们寻找工作更加不易。勤工俭学学生是依靠华法教育会的借贷求学,华法教育会财力有限,1月底宣布脱卸一切经济上的责任。这个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使数百个失业的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学生断了生计。2月28日,由李维汉、李富春、贺果、张昆弟等组织的《世界工学社》发起,400名学生到大使馆请愿,要求进入即将开学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以4年为限。相持大半天,请愿群众被法国警察驱散,但却迫使其延长了发放救济费的时间。

周恩来闻讯赶到巴黎调查这一事件,并于3月21日写出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通过调查,周恩来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蔡畅、赵世炎、陈毅

等。从此他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此时周恩来 22 岁。

3 月,周恩来经觉悟社社友刘清扬的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曾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在国内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中国共产党 8 个发起组之一。他加入组织后,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就是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斗争。

6 月 16 日,法国报纸登出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到法国借款的消息,勤工俭学学生首先反对。6 月 30 日周恩来、赵世炎、袁子贞、李立三、陈毅等 300 名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召开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冲进使馆。8 月 13 日又召开第二次大会,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借款协议上签字。

9 月份,周恩来又参与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陈毅等 100 多人被驱逐出境,但是这场斗争却锻炼了年轻的周恩来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斗争的失败教育了大家:上学都如此困难,实业救国从何谈起,这只是不可实现的幻想。从而使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

在领导勤工俭学运动的同时,周恩来对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作了详细的考察,为《益世报》写了 20 多万字的报道。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更加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经过反复“推求比较”,到 1921 年秋,周恩来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因时制宜。”

1922 年 3 月初,周恩来来到德国,接到邓颖超的来信,得知